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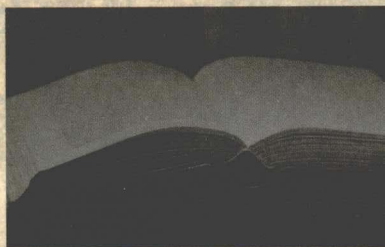


外教社
博学文库

译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碰撞

——翻译社会学视阈

Collision between the Worlds of Translated Text and
Societal Reality
—An Approach to Sociolog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胡 牧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重大招标项目“文化与全球化研究”

译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碰撞

——翻译社会学视阈

Collision between the Worlds of Translated Text and Societal Reality
—An Approach to Sociolog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胡 牧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碰撞: 翻译社会学视阈/胡牧
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外教社博学文库)

ISBN 978-7-5446-2100-7

I. ①译… II. ①胡… III. ①翻译理论—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8799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梁晓莉

印 刷: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7.875 字数 22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6-2100-7 / H · 0930

定 价: 2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诗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链接

——翻译社会学视阈

博学文库 编委会成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姓 名

王守仁

王腊宝

王 蕾

文秋芳

石 坚

冯庆华

吕 俊

庄智象

刘世生

杨惠中

何刚强

何兆熊

何莲珍

张绍杰

陈建平

胡文仲

秦秀白

贾玉新

黄国文

黄源深

程朝翔

虞建华

潘文国

戴炜栋

学 校

南京大学

苏州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四川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清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浙江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中山大学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北京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出版说明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始终坚持“服务外语教育、传播先进文化、推广学术成果、促进人才培养”的经营理念,凭借自身的专业优势和创新精神,多年来已推出各类学术图书 600 余种,为中国的外语教学和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展示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成果,并为广大优秀的博士人才提供广阔的学术交流的平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外教社博学文库”。该文库遴选国内的优秀博士论文,遵循严格的“专家推荐、匿名评审、好中选优”的筛选流程,内容涵盖语言学、文学、翻译和教学法研究等各个领域。该文库为开放系列,理论创新性强、材料科学翔实、论述周密、严谨、文字简洁流畅,其问世必将为国内外广大读者在相关的外语学习和研究领域提供又一宝贵的学术资源。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序言

胡牧的博士论文《译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碰撞——翻译社会学视阈》已获得外教社博学文库的入场券,年末即将交付书稿。他嘱我为他写个书序,我是没有辞却的理由的。他在本科读书期间我就教过他的翻译课,2000年又在我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学业,2004年,我院博士点获准招生,他又成了我这一方向的开门弟子。2007年他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博士学位。现在他已成了一名年轻的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看到他这些年来的进步和所取得的成绩,作为指导教师,我是十分高兴的。看到一代青年人的成长,学术事业传承有人,我们这一代人也都感到欣慰。

胡牧是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每学期也同其他老师一样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同时还潜心研究,在三年之内完成了20万字的博士论文,其中艰辛他体会当然最深,也是我们可以想见得到的。现在这一代青年人面临着许多现实生活中的挑战,承受着我们那一代人所未有承受过的压力,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金钱的诱惑力难以抗拒,有多少人已经放弃了向学术前沿冲击的念头,转而去兼职,赚外快,以应付来自现实生活的压力,坐得住冷板凳的人越来越少了,在学术界已受到严

重污染的今天,还能奋力开拓,锐意创新的人更是难能可贵了。胡牧就是这块学术净土的一个守望者。

他所选择的题目——翻译社会学,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传统的译学研究囿于文本之间,专注于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规律,而完全忘记了翻译活动自有史以来就是一项社会性活动。它产生与文化交流的需要,满足人类社会共同进步的要求,并受到社会与文化规范等的制约。而传统的研究几乎成了纯语言学的性质,只涉及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不注意语言系统外部的种种因素。自20世纪70年代话语语言学的兴起,这一藩篱才被打破,而90年代以后的解构主义思潮、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人类文化学的翻译转向、翻译学的文化转向等等的趋势都把翻译活动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但系统地把翻译学与社会学密切结合起来,开创一个跨学科的系统研究还并没有真正开始。而胡牧的这部著作却做了一个好的开端。我们都知道早在1972年,James Holmes就提出过翻译社会学的这一概念,但限于当时的学术环境与文化背景,他并没有把这一概念化作一个系统理论。但这两个领域的结合是一个迟早的事,因为翻译活动究其实质是一项社会活动,无论它的发生与发展,其功能与评价都是社会性的。翻译活动沟通着人与人、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促进着人类的进步。试看我国的一切社会变革哪一次不与翻译活动密切相关呢。凡是读过邹振环教授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的读者都会有很深的感慨:翻译于社会之进步,功劳大焉!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到中国社会的变革,从科学的进步、学科的发展到知识的共享,又有哪一样离开过翻译工作者的贡献呢?

但是翻译学与社会学如何交叉互动呢?这似乎涉及学科学中的学科互渗的一些原则。胡牧的这部著作以翻译学为学科本体,以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为指导,以人的社会实践作为基础,以译学范式的反思批评

作为前导,在此基础上展开了翻译学的社会视阈的研究,这是译学的一个新的视角和视阈,这也是对建构主义译学思想的一个充实和拓展。21世纪初,我曾提出建构主义的译学思想,在《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2006)一书中作了系统地阐释。但是作为一个新的译学范式,其内容仍属纲领性的,只是个框架,许多内容仍亟待深入开拓,而这又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为的。我曾希望我的博士生们在这理论系统内选择适当的题目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可喜的是他们也多数人有些兴趣。胡牧选择了社会的视角。有人选择了实践哲学视阈下的译学研究,有的选择了语用学转向与译学研究,有人选择了翻译的伦理问题,也有的把意识形态纳入文本分析,等等。我相信,在众多青年学子的参与下,建构主义译学研究必然会深入下去,有更强的解释力。

是为序。

吕俊

于龙江公寓

2009年11月29日

前言

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发展潜力体现在翻译理论、翻译历史、翻译批评方面的分类研究与系统建设相结合,从而形成兼容并蓄的开放体系。它要求翻译研究者们对纷繁复杂的既有成果分门别类、细致梳理、归纳概括、瞻前顾后,将其放在历时与共时层面合理探究,勾勒全貌。同时,鉴于其跨学科的特质,不妨拓展翻译研究视阈,巧妙合理地吸收相关领域的既有成果,从而打开又一扇窗,发现又一天地,展现另一世界。

本书是将翻译学研究置入社会学的视角之下的尝试,渴望相对全面地阐释翻译活动与社会的关系,但又不能使翻译学科再次沦为其他学科的附庸。这就要求本研究力争突破原来的译学研究只关注文本或语言转换规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或只是研究影响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而忽视文本的倾向(如解构主义的译学范式)。

本研究以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与社会进化的理论对翻译活动进行系统地考察,从而把翻译研究与社会学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作者旨在通过梳理翻译研究已有成果,探求新的理论依据,层层揭示翻译社会学的“名”与“实”。翻译社会学是 James Holmes 在 1972 年曾经提出过的一个概念。他指出人们对翻译文本在何时何地以及产生何种影响的探讨一直没有引起足够关注,而如若给予充分重视,这种研究完全可能发展成翻译社会学(也许叫做社会翻译学更为恰当准确,因为它不单是社会学的,而且也是翻译学的一个实实在在的领域)。

但他并没有深入展开,只是阐述了这种理念。如何深入地展开这一理念,需要时代的响应,需要中外翻译研究发展的水到渠成。这涉及对译者主体与他者的关系、社会操控、社会传播与文化消费甚至新的翻译媒介形式(网络翻译)等诸多方面的深入探讨。

通过层层论证,作者坚定地认为翻译研究无论发生怎样的转向都最终应从翻译活动对社会发展的贡献角度来评价,这实际上是让翻译活动摆脱科学主义思想束缚,让翻译研究回归生活世界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因此,全书都在以译本为中心,探讨其“何时何地产生何种影响”。本书在撰写与修正过程中,一直渴望能够给翻译社会学之“名”以“实”。尽管不知能在何种程度上揭示论题,但愿能以此为切入点,求教于同行的专家、学者。

衷心感谢导师吕俊教授对我十余年的谆谆教诲,感谢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专家给予我学术上的指导,感谢匿名审稿并给予宝贵修改意见的专家,感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梁晓莉编辑的悉心工作,使本书得以面世。

书中不妥之处,渴望得到您的批评、指正。

胡 牧

于宝船听涛

2010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本领域的前沿动态	1
第二节 本课题的研究目的	13
第三节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15
第四节 本课题的重点和难点	17
第五节 结论	18
第二章 译本世界的理论基础与话语资源	20
第一节 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	20
第二节 话语资源：个体、社会、实践	35
第三章 译本世界的困惑与反思：解构抑或建构	47
第一节 “范式”的演进与“转向”的焦虑	47
第二节 “以本为本”与译本世界	55
第三节 “以人为本”与现实世界	62
第四章 译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碰撞	70
第一节 真实性抑或艺术性：现实世界的译本反思	73

第二节	个体性抑或社会性：译本的社会镜像	87
ii	第五章 译本的社会镜像之一：自我审视与他者重构	104
第一节	作为行动者的译者	109
第二节	作为生产对象的文本	122
第三节	作为监管的把关人	130
第六章	译本的社会镜像之二：社会操控与主体沉浮	137
第一节	权力与话语	138
第二节	规范与系统	141
第三节	个体与社会	147
第七章	译本的社会镜像之三：社会传播与资本消费	152
第一节	社会性与学术性传播范式	153
第二节	消费群体与译本价值	180
第八章	译本的社会镜像之四：媒质变迁与译本流变	205
第一节	文本世界的超越：网络翻译的兴起与解读	207
第二节	虚拟世界中的译本：文字与图像	211
第九章	结语	217
	参考文献	229
	后 记	237

第一章

导 言

第一节 本领域的前沿动态

一、发展脉络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梳理。譬如,杨自俭教授认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对象包括八大要素:客观世界(自然、社会、思维三领域)、原文作者、原文、原文读者、译者、翻译过程、译文、译文读者。这是一个整体系统,既包括主体与客体,也包括过程、结果与影响;既包括翻译学内部各项因素,也包括其外部相关内容。多数学者都认为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开放性的、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①

陈福康先生则认为,我国译论研究的客体中有很多是西方译论没有涉足的领域。而且,我国的译论起步就达到了很高的认识水平,如道安

^① 杨自俭,《如何推动翻译学的建设与发展》,《上海翻译》,2005年第3期,第2页。

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说,涉及翻译中语言结构、风格文采、民族心理、文化特质、内容神韵、原文旨义、艺术效果等,充满了真知灼见,其理论水平远远超过同时期西方的只言片语的译论。譬如,赵元任等从语言学角度论述的译论比西方语言学派更具有实际价值。魏象乾提出的“正译”、马建忠阐述的“善译”实际上就是比西方要早 80 多年的“等值”理论,他们虽未使用“等值”术语,但其论述是很清楚的,而且比使用“等值”一词在理论上要严密得多。尤其是从文学角度探索的译论,可以说日臻完善,更是西方译论望尘莫及的。此外,从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各个角度讨论翻译的都不乏精彩译论。遗憾的是,这些译论,从个别论者来看,好像是随感而发,经验之谈,不成体系的。不过,虽然前辈们有很多译论没有充分展开论述,但它们已形成命题,为我们深入讨论奠定了基础。至于我国的译论能否成为系统科学的独立体系,关键在于我们的挖掘和总结。正是如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要求在此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译论体系,而不是去西方的菩提树上摘取现成的果子。^①那么,西方的菩提树又结了什么果子呢?在西方,语言学、文化、多元系统、解构主义、功能、目的论、女权主义、操控等流派在翻译研究中承前启后、彼此交融,扩大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推动了翻译学的发展。

可以说,这些综述较好地反映了中西译论的概貌,尽管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譬如,将思维列入客观世界同自然、社会并而存之,是否理由充分;认为我国的译论能否成为系统科学的独立体系,关键在于我们的挖掘和总结等等。反复思考之余,不妨尝试性地将中外译论研究的脉络笼统地表述为“四个中心、三种范式、两次转向”。

1. 四个中心

这似乎不及前面提及的八大因素全面,然而,“中心”就是地位。源语作者、源语文本、译文读者、译者都分别作为译论研究的“中心论”被探讨过或正在被探讨甚至将永远被探讨下去。作为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基本因素,对他(它)们作为“中心”来探讨是无可非议的,这反映了人们在

^①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27页。

这一领域认识观念的一次次转变与飞跃。

以源语作者为中心,理据在于,任何源语文本的形体与血肉都是作者赋予的,文本是作者思想的载体,所以翻译过程就是译者通过源语文本揣摩作者心思或与作者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从而将作者通过文本表达的心声尽可能忠实地传递给译文读者。以源语文本为中心也有其合理性,因为文本作为连接作者与译者的媒介,寄托了作者的思想,又是译者展开活动的依据和舞台。以译文读者为中心,是因为翻译活动的目的和对象只有通过译文读者的参与或评价才能实现;以译者为中心,是因为作者的思想、文本的理解、译文读者的接受等都需要凭借译者来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以来,对翻译主体及其主体性的探讨引起了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国内的代表性论文见许钧,穆雷、诗怡,查明建、田雨,屠国元、朱献珑,孙艺风,杨武能,袁莉,郑海凌以及胡庚申等。^①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论文在陈述中都借鉴了国外同行在这一领域的成果。在此不再赘言。

从现有成果来看,对翻译主体方面的探讨可以作出如下归类:(1) 翻译主体意识;(2) 翻译主体的界定;(3) 翻译(或译者)主体性;(4) 主体间性。对这一课题进行探讨的代表性的切入点似乎可以归类为:(1) 从“创造性叛逆”谈起;(2) 从对翻译家的研究谈起;(3) 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4) 从翻译规范谈起;(5) 从阐释学谈起。

通过反复(甚至是重复)论证,学者们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澄清了诸多问题:(1) 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文化研究日益凸显的必然产物;(2) 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的创造性;(3) 主体间性是指作者、译者、读者主体之间相互交往的特性。毋庸置疑,对“译者中心”的探究取得了相当成就,使译

① 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第6—11页。穆雷、诗怡,《翻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兼评中国翻译家研究》,《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第12—18页。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第19—24页。屠国元、朱献珑,《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中国翻译》,2003年第6期,第8—14页。孙艺风,《翻译规范与主体意识》,《中国翻译》,2003年第3期,第3—9页。杨武能,《再谈文学翻译主体》,《中国翻译》,2003年第3期,第10—12页。袁莉,《文学翻译主体的诠释学研究构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74—78页。郑海凌,《译者的形象》,《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1期,第115—119页。胡庚申,《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中国翻译》,2004年第5期,第10—16页。

4 者的重要性得以发掘和体现,为译者的身份定位找到了理论依据,为翻译研究开阔了领域。

仍然回到“四个中心”上来,从已有成果来看,这方面的研究至少体现出如下特点:(1)充分挖掘、多方论证,此起彼伏。也就是说,上述的“中心论”随着研究的深入与视角的转换,不同时期得到了不同的凸显;(2)体现了译论研究的多元性,丰富了研究视野,拓宽了相关领域,融进了邻近学科的研究成果;(3)西方的翻译理论以及阐释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被有效地引进我国,掀起了我国译论研究的小高潮。

但是,细细琢磨,有些研究也给人留下了一定的困惑:(1)不少论者的论调“洋味过浓”,似乎新的理论只有从西方才能寻找到依据与渊源;(2)对于一些“意识”或“觉醒”过分夸大,好像发明而不是发现,尽管其中不乏“舶来品”;(3)重复论证过于严重;(4)“中心”的论调源自“他者”,因此“自我”受到忽视或遮蔽;(5)“中心”既然是叠加出现的,就应该给予总体性关照。

2. 三种范式

“三种范式”指语文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范式。需要说明的是,它们同样是叠替交加的存在状态,只不过在某一时期尤为凸显而已。

在传统的语文学范式阶段,尽管中西方认识观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翻译家们却不谋而合地受到了直觉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深刻影响。无可否认的是,这一阶段对翻译实践过程中的感性认识和经验的逐步积累对翻译理论的下一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西翻译理论发展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在主客体混沌不清的认识观状态下,译者主体难免会更多地侧重对字、词、句的“巧妙”翻译,而这种境地又是“不可言状”的。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译者缺乏对篇章的关怀。同理,体现在译论方面,这一范式阶段更多的只是一些不成体系的散论、心得,或浅尝辄止的翻译赏析、批评等。这种情形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出现了极大的转折。

笼统说来,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鼎盛阶段大约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依据的传统翻译研究重视共性、齐一性,排斥个性与差异性,因此,它一直是以一致性追求为目标的,把源语文本作为一个一成不变的客体来看,认为文本的意义是语言通过规律去预先设定的,其意义是具有确定性的,而且任何人只要按照语言规则去解读,都应获得相同的理解。^①可见,结构主义给人们带来分析的方法,使人们通过对客体的分析,认识其内部的层次与结构,从而更好地把握认识的对象。这种研究摆脱了语文学范式的神秘性与不可知性,让人们转而关注语言规律与文本结构。为此,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研究范式曾一度取得瞩目成就。但是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被禁锢在文本对比和语言(信息)转移的范围内,有关翻译活动中那个最活跃的成分——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研究就被完全忽视了。这是因为,以文学作品的翻译为例,结构主义理论不能具体地论述文学作品的特点,不能论述文学作品的历史差异和美学差异;结构主义把文学的概念变成了写作的概念,因而文学作品变成了符号学的“文本世界”。

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进入解构主义阶段。除了诠释学流派,解构主义范式阶段还体现在目的派、操纵派等观点上。其共性都在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解上。譬如,女权主义者重视译者的存在,强调译者对源语文本的占有和摆布的主导地位。操纵学派则认为文学翻译实际上是译者做出抉择和摆布文本的过程。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为,同其他行为一样都有一定的目的。由此,译者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总会按照自己对读者和译语需要的理解去制定自己的翻译策略。这些对翻译主体性的认识对我们译学研究大有启发。^②但是,解构主义思潮由于自身缺乏一个整体性理论框架和统一的纲领,因而,可以说它只是一种精神、一种反思性精神、一种怀疑主义和破坏精神、一种否定性思维方式。所以,在它之后,人们会茫然,会困惑,原来的理性被破坏了,原来的结构被解构了,而它又没有带来一个新的理性。这使得走到今天的翻译学面临

① 吕俊,《翻译学:解构与重建——论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对翻译学的建构性意义》,《外语学刊》,2002年第1期,第87页。

② 屠国元、朱献珑,《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中国翻译》,2003年第6期,第8页。